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1.002

明代小说海洋书写中的海洋意识

——以“三言二拍”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中心

程雁群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

摘要: 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数量多、涉及面广,折射出明代海洋生活和明人的海洋意识,是研究明代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人在海洋意识方面,呈现出官方与民间二元分野的状况,在明代小说中官方与民间对海洋认知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对海洋财富和海洋商贸活动认识方面的观念差异。明人小说中呈现的海洋书写重点突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海洋商业和海洋政治军事意识,二者分别体现在对私人海洋贸易多方面的认知,对倭寇的构成及其具体情况的了解。梳理回顾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具有抽离西方“殖民”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意义。

关键词: 明代小说;海洋书写;海洋意识;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 I207.41;K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4)01-0009-09

一、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

海洋在中国古代小说书写中不是一个常见的主题,这与海洋在古代中国地理的边缘性地位相关。中国内陆纵深、地大物博,地形复杂多样,以山河为主导,仅东、南面靠海,因此内陆文化占主导地位,还与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有重要联系。海洋作为一个遥远的异域空间,在古代人心中烙下的是天然的危险、恐惧、神秘、奇特的虚幻缥缈的印记。随着前代的文化积累和明代官方海外活动的发生,明人小说中出现了大量艺术上较为成熟的海洋书写,反映了明代已经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海洋意识特征及表现。

对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与海洋意识的研究不仅可以从史学、文献学的角度进一步了解明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海洋生活,以海洋这个客体投射到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追溯明代海洋意识的嬗变,探索其意识能动性下创造的海洋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新的海洋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我们不再成为西方视角中的“他者”,更不再接受“自我矮化”,从西方资本主义精

神基础形成的文明理论体系中抽身,用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的中国精神来看待明代小说海洋书写及海洋意识,给予其应有的价值定位,并把握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脉动。

明代小说中的海洋内容、海洋意识及其海洋精神是“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借鉴、继承发展的文化源泉,也是我国现行的海洋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及海洋意识的深入研究,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具有实现海洋强国的文化战略意义。

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数量大,内容涉及面广。明代涉及海洋书写的小说数量超过前代总数之和,可查的小说有50多部,总篇目有200多篇,涉及海洋生物、气象、海外传闻以及海外战争、倭寇、海事、商业、外交、宗教信仰等内容。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打破了传统的神话式的单调模式,叙事中的虚化色彩与现实的记录相结合成为一种叙事方式,表现为自觉地虚构的特征^[1]。这种叙事方式自觉地虚化与现实相结合的书写特点可以让我们从小说的角度出发,剥离虚化的外衣,为进一步深入看待明代社会现象和社会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明人小说的海洋

收稿日期:2023-1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史’纂述及影响研究”(21BZW119)

作者简介:程雁群(1993—),女,湖北十堰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书写涉及的小说数量庞大,本文主要以“三言二拍”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的海洋书写为研究材料,兼以其他可考的明代小说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目前对于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大多是将其视为以海洋为主题的一类小说,有学者将之称为“海洋小说”^①,也有“涉海小说”^②的指称,由于目前学界对此类小说的概念尚未明晰,本文选择“书写”一词来指代明人小说中有关对海洋内容进行描述的部分。本文涉及了大量笔记小说,故在此特说明所取“小说”概念指经史子集之外的庞杂文类^[2]。已有研究对这部分内容的探讨大多是从海洋文化以及不同阶段的海洋文学、叙事学、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明代小说中的一些篇目,或者是对单篇的小说中的某个叙事类型的小说的研究,鲜少有对明代海洋意识的整体性研究。因任何文学涉及海洋书写的作家、书写的内容、读者接受的过程都无法脱离海洋意识的影响,明人小说中的海洋意识可谓明代人对海洋生活认识的投射。由于明人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具备的这种特殊意义的史学和文献学价值,对明人小说海洋书写中的海洋意识的研究就显得必要且极具价值。

二、海洋书写中的官方—民间意识分野

海洋意识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学界对此概念的定义仍有分歧,一般认为其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财富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竞争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安全意识六个方面^[3]。明代的海洋意识随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而较前代更为深刻,官方和民间海洋意识在不同层面或合或分,二者矛盾聚焦于海洋商贸活动上,通过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我们可一窥极具张力的官方与民间海洋意识的博弈情状。

明代官方对海洋的态度应时而变,尽管大多数时期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人海外活动,但官方在前代的影响下对海洋活动并没有完全禁绝,多少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官方海外活动,官方与民间海洋意识与实践活动的矛盾焦点集中体现在海洋商贸政策上。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主要是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制度,其本质是明代朝廷对于海外活动的官方控制。海禁政策并非禁止一切海洋贸易,只是限制民间私人海外商贸活动。朝贡贸易制度是基于外国来华的朝贡关系的贸易往

来,现代学者认为其具备官方主导的商业性质^{[4]7-9},亦有出于海防安全等政治的考虑,以及外交上与亚非国家建立联系的意图^③。海禁政策严格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尽管如此,民间对海洋的认知水平还是得到了不断提高,并表现出屡禁不绝的逐海倾向,在官方政策的罅隙中,私人贸易行为从未被禁绝过,并始终与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胶着互动^{[5]47-49},形成了官方—民间的贸易二元格局。通过明代小说对官方及私人海外商贸活动书写的内容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对海洋认知的差异。

(一)对海洋财富的观念

官方、民间的海洋意识在本质上是同源的,均源于对海洋的重视,这一意识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官方活动直接相关,明人自此对海洋有了更丰富的认知,更重视海洋开发的作用和价值,出现了大量与海洋相关的专著,明代海洋意识自此发展起来。以《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与“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小说,其海洋书写反映了官方和民间对海洋财富的不同观念。

罗懋登写作《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时参考了费信《星槎胜览》、马欢《瀛涯胜览》等著作,故而小说对下西洋的朝贡贸易中郑和团队肃清海道,恢复航线,“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以安业”,在“海商辐辏之地”^{[6]59}建立多个贸易据点及方便贸易货物中转和商品集散的“外府”等便

①海洋小说是按照西方小说的理论界定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倪浓水在《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中提到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三层含义之一是海洋题材,即题材上的“涉海性”,凡是叙事题材与海洋有关的都可以包含进来。后一些研究者亦使用“海洋小说”的概念,如毛睿《论明清海洋小说中的取宝主题》(《文教资料》2011年第12期)、李宁宁的硕士论文《明清海洋小说叙事特色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1年)即沿用了“海洋小说”的表述。

②对这一问题,郭杨在其硕士论文《乾隆嘉庆时期涉海小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中承认中西海洋文学具有差异性,对海洋文学定义理解亦有分歧,他认为应当称之为“涉海文学”,意为“与海洋发生关联的文学”,后大多学者采用“涉海小说”的概念。如倪浓水《〈聊斋志异〉涉海小说对中国古代海洋叙事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蒲松龄研究》2008年第2期)、倪浓水《王韬涉海小说的叙事特征》(《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1期)、范涛的硕士论文《海洋文化与明代涉海小说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2011年)。

③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从校订版〈历代宝案〉发现全球视野中的琉球》(海交史东亚文史研究动态网,2022年8月14日)中将朝贡贸易关系放在亚洲海洋贸易体系中研究,他认为朝贡贸易关系是围绕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现代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海禁政策背后的经济主导因素,见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7-90页)、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2页)、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8页),等等。

于官方商贸的成果有所体现,并对郑和船队设置城垣、更鼓楼,仓库,巡警开洋^{[7]112}的情形表述较为详尽专业,小说中出现了“宝船”“南船”“战船”“粮船”“巡船”“楼船”“哨船”“海船”“海梭船”“埠泊”“汉港”“海沿”“海峤”“埠泊”等词汇,对这些语词的使用表明了作者对官方朝贡贸易细节的熟悉。

《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小说中描写郑和船队与海外诸国间朝贡贸易往来,不论与明廷友好结交,还是战败求和,最终两国珍宝互赠的场面都用浓墨重彩的笔法进行了叙述,如小说第八回描写海外藩王来贡之物,如“金珠、宝贝、庵萝、波罗、熏萨、琉璃、加蒙绞布、独峰福禄、紧靱兜罗、琥珀、珊瑚、车渠、玛瑙、赛兰、翡翠砂鼠、龟筒”,及“一等果下马”“朝霞大火珠”“歌毕佗树”“淋漓金颜香”^{[8]103}等宝物的精妙绝伦,以及朝廷回赠诸国的场面;第45回描写了重迦罗国老者赠郑和等人“羚羊十只,鸚鵡一对,木绵百斤,椰子百个,林酒十尊,海盐十担”,以及众番人献上的“豹皮、熊皮、鹿皮、羚羊角、玳瑁、烧珠、五色绢、印花布”^{[8]426},这些都获得明朝的回赠。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观点,“贡品和馈赠之间的关系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买卖关系,这种交换可以看做是一种商业交易”^{[9]23}。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重点展现了朝贡贸易过程,从藩王、进贡者展示贡品,明天子四洋馆礼待朝贡使者,到大宴群臣,赏赐官员,侧重叙述朝贡场面宏大,万国来朝之盛况,海外珍宝的价值和作用并不在描写范围内,可见作者流露出明显的宗主国心态,换言之,海洋财富的意义在于彰显其价值之外官方贸易中明王朝朝廷政治的强盛、外交的广泛以及和睦友好之态。

与之相对应的民间贸易则不然,民间治生的需求以及对海洋珍宝财富的渴望,是民间私人海洋贸易的直接源头。海外商贸带来的财富对明人充满了吸引力,张燮《东西洋考》中就有叙述“其指南所至,风樯所屯,西产多珍,东产多矿”^{[10]11},明人笔记中记载时人寻求海外的奇珍异宝售于国内,将国内的绢、丝、茶叶、瓷器等生活用品高价在海外卖出,“佛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11]13}。“三言二拍”中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杨八老越国奇逢》《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等篇,《型世言》《辽阳海神传》和明代笔记小说《庚巳

编》《万历野获编》等对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利求富的心态和现象刻画十分深刻。由于海上奇珍异宝可获取巨额利益,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纷纷行商于海外,陆人龙在《型世言》中借人物之口道出海中商贸之盛,及海中的“珊瑚、玛瑙、夜明珠、砗磲、玳瑁”“石首、鲳鱼、鳓鱼、呼鱼、鳗鲡”“乌贼、海菜、海参”“虾子、虾干、紫菜、石花、燕窝、鱼翅、蛤蜊、龟甲、吐蚌,风饷、弹涂、江鳐、鱼鳔”^{[12]312}等物的价值及其商业用途。《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涉及湖广商人和广东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叙述湖广商人蒋兴哥前往广东合浦买珍珠,蒋兴哥与合浦珠宝商宋氏父子发生争执的情节,这与王士性《广志绎》记中“广南所产多珍奇之物,如珍珠、明珠、玳瑁……珠池在合浦东南百海里中、有平江、青婴等三数池,皆大蚌所生也”^{[13]94}的记载相吻合。《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叙述文若虚一行到达福建码头时所见接待海客的“小经济牙人”,这些经济牙人主要负责帮海商将货物脱手,专门服务于沿海商业活动,从中获取利益。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十六的“异宝难识”,及《庚巳编》中海宁王屠父子购得海中神物珍宝得以致富的叙述都可体现明人对海洋珍宝的认识与渴求。

由明人小说中对民间海洋贸易的描写,可以看出明人贩海生利的观念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淡漠”,他们追求海洋财宝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生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闻风争至,农亩之夫,辍耒不耕,斋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致富也”^{[14]84}。这些商人渴望向海洋进发,在海洋这个宏阔的天地中博得财富与名利。

(二)对商贸活动的认知

相较于民间治生需要及对海洋财富的渴求,小说反映出官方对海洋财富虽然重视,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其视作外交的附属功能,体现的是朝廷官方的天恩。基于此,小说在海洋书写中所体现的商贸活动观念,官方和民间亦各有侧重。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活动,既包括官方之间的商业往来,如《瀛涯胜览》记载满刺加、柯枝、锡兰等国王“赉宝物,随同回洋宝船进贡中国”,以及贵族阶层或商贸大贾与郑和船队“大赉西洋,贸采琛异”;还有官方组织的与海外诸国民众间的商贸行为,例如在阿丹国、柯枝国等国家就允许有珍宝的商人自行买卖,“但有珍宝,许令买

卖”,“专一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15]47}。这些笔记小说中对产物、贸易需求和货币度量,甚至地方的贸易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如《瀛涯胜览》中对爪哇国的“斤秤之法”、古里的“击掌定价”习俗、古里地闷的妇女主管商业买卖等记载。《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对海外商贸活动大多采用侧面描写,如重伽罗的下层百姓与船队的商贸往来。小说中这些番人形象丑陋,蓬头跣足,自述生于外邦为谋生而不得不半匪半商的行径。小说对商贸活动的直接描写较少,却对经过地区的民俗、人情、地理等情况有较多体现,如商贸活动中华侨分布情况的记载:“新村……原系沙滩之地。有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头目,民甚殷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杜板……约有千余家,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以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8]443},还提到杜板的鸡鸭鱼菜价格低贱,这与《西洋番国志》中对爪哇杜板的记载一致,地方人情与《瀛涯胜览》所载暹罗国“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7]15},大多为广东及漳州人流居亦相符合。小说中除了商贸活动中对华侨的记载,还有对当地民俗的描述,如在爪哇国船队行驶进入港口时行商所见:“风俗,妇人求嗣者,备酒肉饼果等物,祷于老猴”^{[8]383}。向老猴祈祷求嗣的行为是当地早期动物崇拜的体现,颇具地方特色。小说中还有大量对朝贡贸易途经各国的地理等情况的描述,如柯枝国的气候“半年下雨半年晴”等。

与侧重于官方贸易活动中的贸易习俗、民情、地理的描写不同,明人小说对海外私人商贸活动的书写更为直观、详尽,详细体现了海外商贸活动的曲折、商人的智慧、海外商贸的特点以及海外商贸的巨额利益,等等。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所叙吉零国,海商将国内商品以三倍的价格卖给当地人,再将吉零国的货物高价销往内地,此种海外贸易场景的描写,揭示了民间海外商贸商品的特征在于以奇为胜。主角文若虚正是意外地将内地低价所购橘子卖出稀罕物的价格,正是以“囤积居奇”的“转运汉”身份在海外发迹。作者于笔下写出两种“奇”,一是通过信息差,将内地与海外的“奇”物高价售出;二是获得海外珍宝,通过“奇”物,得以致富。鼍龙壳便是第二种“奇”。明代笔记小说中大多描述第二种“奇”,如朱国祯《涌幢小品》所载《古铜镜》中,渔人王甲所得古铜镜,“其形如日。光彩赫然射

人”^{[16]714},自是因为这一奇珍异宝,王甲才得以从祖辈贫苦渔民出身转为暴富。《都公谈纂》记载了郑和下西洋途中的一则奇事:“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盘中”,“得珠不可胜数,其中有径得珠不可胜数,其中有径寸者”,毛医士随郑和途中得此奇物,“其家因以致富”^{[17]769},这是官方海外行商得遇奇宝发家致富的类型。

明人小说中所体现的官方与民间在海洋财富和商贸活动上的观念分歧,从根本上反映了明代官方对海洋贸易的掌控,以及对海外民间商贸的轻视,尽管官方重视朝贡贸易,但更多以之为外交层面的支持,官方更为重视的是商贸活动中的习俗、民情、地理等情况。虽然官方采取了高压海禁政策,但是民间海洋商贸屡禁不止,数度蓬勃发展,小说中亦刻画了私人海洋贸易的民生所需,以及随着海洋意识的深化,明人以海致富的渴求心态,故而对海洋珍宝、贸易过程、商业手段等情节的书写细致而深刻。

三、海洋书写呈现的海洋意识

较之海洋意识这个现代理论,明人对海洋的认知还处在一种较为朦胧、不成体系的认知状态中。按照上述借鉴的海洋意识概念,从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可知,明人大多停留在海洋财富(商业)、资源以及国土(军事)方面,又因海洋资源部分大多已在海洋商业或国土方面的书写中体现,故不单独论述。

(一) 海洋商贸

如上文所说,明代的海洋贸易体现出官方—民间海洋贸易的二元结构,明代小说中的海洋书写体现的这一状态,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视角投射出明人对海洋贸易的认知。由于民间商贸活动中更多体现了明人对海洋商贸特征等认知,故本节仅观照民间海洋商贸活动。

民间贸易发展具有阶段性,民间海上贸易由明初私下的小规模行为不断发展壮大直至明后期的大型军事—贸易海商集团如郑氏海商集团的出现,这一过程在明代私人对于海洋贸易的认识及追逐轨迹在明代小说的海洋书写中充分得以体现。明代海洋书写中体现了明人对私人海洋贸易的过程、手续、行业产业链等情况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士人成为海洋商贸的书写对象及书写者;海洋书写表现了海外行商之苦与难。

明代小说海洋书写体现了明人对私人海外贸

易发展动态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从海洋书写中行商的过程、手续、行业 and 完善的产业链描述可知一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中所描述的福建码头:“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济牙人攢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18]10} 经济牙人这一行业的出现,是民间海洋贸易充分发展的产物,可见民间海洋贸易已形成产业化链条化。除了产业链,明代的港口亦较为发达,其中月港在笔记小说中较为常见,张应俞笔记小说《杜骗新书》中多有关于海澄贸易的描写,江西陆梦麟“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余担,复往芜湖发卖”^{[19]387},徽州人丁达“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19]456},可见海澄是东南地区海外贸易交通的中心海港城市。

不仅如此,明人海洋书写还体现了明代社会对逐海求利的认可程度,书写中大量士人参与海洋贸易即为明证。“三言二拍”中《王氏子因风获盗》中的主人公从小习儒学经,却“废发业不成,却精于商贾榷算之事”^{[18]127};《杨八老越国奇逢》里的杨八老原是读书人,其海外奇遇源于在沿海经商之念:“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贍家之资”^{[20]188};《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描写的是文人从商到海外的故事;《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主人公程宰家中世代从文,因经商风气放弃科举从商,“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18]156};士人出身至其后转换海外经商的行业自然流畅,主角并未出现心理上的犹豫矛盾,家庭和社会也未有阻力和歧视,可见明人实际生活中对海洋商贸的接受、向往,并由于获益者甚多,各行各业的人投身于海洋商贸中,其中士人更成为海洋贸易的书写者的同时,亦是海洋书写的主体对象。

明人对海洋行商过程之艰辛亦有清晰的认知,小说中记载了海商经营的艰难,包括海难、匪寇、海禁政策、朝廷贪吏、骗子等各种困难,并往往以难处为机心,翻陈出新设计奇遇进行创作。明代张本的《五湖漫闻》就记录了海商遇难奇遇入仕的故事:

东洞庭傅永纪,正德初商游广东。
泛海被溺,获附舟木,三日夜流至孤岛,
岛惟叠石累坳,遍无纤草。所服之衣,啮

吞殆尽,度不能存,呼天泣日。居于山,饥必至死,附杉木,或可得生。乃复附树木,出没波涛。七日至海滨,见一渔翁张网立,乃拜书询为某处?渔书示曰:“佛郎机国”。永纪又书曰:“我夏人也,覆舟随波至此,赖君可以生乎?”渔遂允为馆谷。久之意气弥笃,以女妻之。永纪善为纸竹扇,一扇鬻金钱一文,不二年至于巨富。佛郎机王召见,即授以爵。正德末年,佛郎机太子以永纪为通事,进刀剑于华夏,武宗礼遇优渥,永纪遂勿复去。^{[21]26b}

这则笔记小说中有海商遇难的情节,海难可谓海外行商的最大灾难,因其不可控而难以避免,故明人小说海洋书写中经常可见对海难的描写,如冯梦龙《情史》中的《海王三》《焦土妇人》《鬼母国》都描写过海难,《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李海在海上遭风遇难,漂流到海岛,遭遇一系列境况,明末清初李渔所著《连城璧》之六《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描述了明代弘治年间广州府南海县别号“杨百万”的商人先遭遇海难强盗后成巨富的故事。张本所叙故事不同之处在于对海难的描写十分真实细腻,同时主人公到了佛郎机国寻觅商机致富,成为高官重臣,回到大明得到皇帝礼待,海商在海外做官的情节在小说中较为罕见。明代人在海外经商遭受匪患的现象亦常见,其中既有商匪亦有海盗,明前期就有官员郑岳在《建巡海道碑记》中称沿海的居民、商人驾驶巨大的船只深入海域“远通番国,近掠商舟,而海岛居民时罹其害”^{[22]2526},朝廷专门设置“巡海道”以控制海上匪患。汪直作为海匪首领,《皇明驭倭录》记载其一则真事,早期他进行商业贸易时,浙江的谢某人抵赖不还钱,后汪直洗劫了这户人家,可见其一切行为都是围绕着经商发生。对海商而言,朝廷禁令亦是行商的难处,明人王在晋的《越镌》叙述了“严翠梧与方子定”海商案件,严翠梧等人为了避开朝廷关卡,“结通关霸”“诈称进香,乘夜偷关”,即使如此遇到哨官围守,也需要向哨兵行贿才能通行,“哨兵追之,乃索得段绢布匹等物,纵之使行”^{[23]495}。可见明人对于海上商贸的艰辛认知接近客观现实。

(二) 海洋军事

明代的海防政策和倭寇患情贯穿着明代历史始终,虽然明代也有海外的军事行动,《三宝太监

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即有相关书写,但与明代的心腹大患——倭寇相比,明代的海外军事行动往往只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是军事威慑。

明代的倭寇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真倭,二是国中“奸民”,明人对此已有评述。关于真倭,俞大猷在《议处日本贡》中即提到明倭寇主要源自日本各岛^{[24]359},王世贞《倭志》亦有类似的见解,可见明人对于真倭的大量存在还是有明确的认知。“奸民”情况较为复杂,有海商,也有被日倭掳走的老百姓,还有主动与倭寇勾结的流民、贼寇、水手等,甚至明后期的许多官员认为国人在倭寇中所占比重很大,《明世宗实录》中记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25]2767},胡宗宪在《题为献愚忠以图安攘事疏》中亦有“至于柘林等处之贼,名虽倭夷,而沿海奸民定居其半”^{[26]3174}的言论。在明人小说的海洋书写中,对倭寇之祸患叙述颇多,可见明人对倭寇的形象、恶行、作战情况已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1. 真倭

明人小说的海洋书写中对于真倭的形象描写较为写实,是明人对倭寇认知的外现,《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有对倭寇外形典型的描述。小说讲述的是明代沿海地区经常发生的普通百姓被真倭掳劫,逼迫他们成为倭奴,在侵犯边海时充作马前卒的故事。在明代其他小说中也多有体现,例如:

外边应了一声,却有带刀的倭奴约五七十个,押著华旗牌到帐前跪下。^{[12]90}

直到三十六年十一月被胡少保用尽千方百计,身经百十余战,翦灭了倭奴。^{[27]569}

小说主人公杨八老在被俘到海外岛上与真倭相处的十几年中,对于真倭的外貌习俗了如指掌,甚至被迫成为倭寇的模样,几乎被明军当做倭寇处置。

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其男子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十九年前在漳浦做客,被倭寇掳去,髡头跣足,受了万般辛苦。^{[20]187}

可见在明人眼中,倭寇的形象是剃着光头,抹着油漆,髡头跣足的形象,在武器配饰上,真倭大多配有长刀,战斗力惊人。明代笔记小说中也描述了真倭赤身露体、秃头赤足、手持长刀的形象。在《涌幢小品》中,王长年好不容易得以从倭寇处

逃脱,回家之后因为形似倭寇便被当做倭寇抓了起来,“长年秃而黄须,类夷人”^{[16]714}。

“秃”“黄须”与上文所说的秃头赤足相似,与日本传统的月代发型是吻合的。明代笔记除了对倭寇外形的描述,对倭寇的恶行亦是详细记述。《杨八老越国奇逢》描述日倭抢夺财物的行为,对日倭的残忍行径有细致的描写: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20]187}

此段文字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真倭对于沿海居民的残害。真倭奸杀淫掠,屠戮边城、火烧房屋,给沿海地区的人民百姓带来了噩梦般深重的灾难。这与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书中对于倭寇侵袭的相关记载一致^①。

明人不仅意识到倭寇的残忍冷血,也在小说中描述了他们的狡诈奸猾的本性,日倭远渡重洋入侵中国沿海,势单力薄,不熟知地形和明军情况,处于弱势,但他们却能以少胜多,达到目的。明人小说多次描写了真倭的奸诈行径。如洪楗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中,仅用几笔就刻画出倭寇的狡猾特点:“倭夷麇战伴走,生兵追之。倭度其半入,以精兵五千,出其不意,由别道尾其后,官军溺死者无算,江水为之不流”^{[28]80},冯琛率军在与日倭对战中,日倭示弱逃走,用以引诱冯琛率军入瓮。《杨八老越国奇逢》一文中,倭寇设探子诱明军深入,“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以为倭寇落单,待明军追逐至包围圈,先头倭寇就把“海叵罗”呜呜作响的吹起来,“四面许多倭贼”提前埋伏,最后果然“犹如火中投雪,风里扬尘,被倭贼一刀一个,分明砍瓜切菜一般。喊得众人一齐下跪,口中只叫饶命”^{[20]188},大获全胜。《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日寇也是相似的圈套,设伏兵,待明军追赶中伏后腹背受敌,任其宰割。明人对日倭从外在形象到恶行、作战过程的详细描写,详尽记录了明代沿海地区深受倭寇残害的史实。

2. “奸民”

上文提到明代国中“奸民”中参与倭寇事件

^①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记录了倭寇残忍的行径:“倭寇袭击府与民舍,为之一空,掳掠少壮,发掘坟墓;杀害庶民,骸骨如山,血流成河;缚婴儿于柱上,沃以沸汤,闻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所孕是男是女,赌酒争胜负,剖腹查明以后,输者饮酒,其荒淫达到不可信状的程度,城野萧条,过者陨涕”,见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的情况较为复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杨复即为代表,被迫成为倭寇的倭奴。上文所举的《涌幢小品》中王长年的事迹,冯梦龙《古今谭概》中《一日得二贵子》、陆人龙《型世言》,以及周清源《西湖二集》中的例子都足以证明这一类普通百姓的人数并不在少数。

除上述被真倭掳掠逼迫的百姓之外,还有为谋生成为倭寇的百姓,有铤而走险者,违背海禁政策,出海打鱼、为商,甚至还有海外走私者。在“三言二拍”中《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杨八老越国奇逢》《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等几篇描写私人海外行商的故事中,主角身份各异,有落魄书生海外行商,亦有沿海居民从事走私来养家糊口。除开这几种之外,还有诸如流民、贼寇者觊觎海外贸易走私的巨额利益,成为官方辞令中的“奸民”“倭寇”,这些人往往勾结真倭和其他海外强盗,形成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商团,明人小说中描写涉及最多,形象塑造最为成功的应当是汪直。

汪直是明代“奸民”中的“渠魁”人物。明人小说中汪直的形象较为饱满。小说作者详细描述了他作为“奸民”首领残暴冷酷的性格,也剖析了他成为倭寇的缘由,并给予一定意义上的同情。周清原小说《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战功》中对汪直的商业道德描述的比较客观,称赞汪直“极有信行”,童叟无欺,诚信守诺,“以此倭奴信服,夷岛归心,都称为‘五峰船主’”。小说中汪直向明廷请求开市贸易,此诉求并未得到回应。汪直直言朝廷不许开市故而为盗贼:“俺请开互市,彼此公平交易,都有利息,并不扰害你中国,你不许俺开互市,是绝俺们生意,俺们不免杀入中国抢掳罢”^{[27]545}。胡宗宪用计策佯装招降汪直,汪直最后愤而回道:“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27]545}这与《明史》《汪直传》《筹海图编》对他有所保留的评价颇为相似。在《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作者也注意到汪直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充分刻画出汪直身其文韬武略的奸雄形象,小说中描述了汪直精通《六韬》,熟知兵书阵法,罗纹龙、孙复初也赞其“既善晓阵法,又精通韬略,吾辈不逮远矣”^{[29]11}。《胡少保平倭战功》中,胡宗宪亦是对汪直有较高评价:“只有汪直狡猾多智,习于兵战得众。”^{[27]562}在胡宗宪招降他时,商量通商事宜变可商量招抚,对汪直复杂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

上述的三类“奸民”成为官方口中“倭寇”不同于真倭侵略疆土,残杀沿海居民,抢夺财宝人口,明代这些笔记小说对国中“奸民”大多以同情之笔暗叹其不易,可见明人对倭寇之患有清醒的认识。

四、对海洋意识的再认识

西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海洋文明进行了文化地理层面的评价,认为西方文明源自海洋文明。黑格尔推崇海岸区域的航海活动,并对中国的文明作出判断:“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联系”^{[30]84},这种阐述将中国视为西方文明中心的“他者”,对中国的海洋文化认知停留在想象中,这种对东方“凝视”的地理文化及等级性论述在国内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并“内化”成为部分学者看待中国大陆文明的视角。

值得反思的是,当我们从这套刻板的思维模式中抽身,重新回顾明代的海洋意识,以及在此种海洋意识驱动下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以我观我”,可以得出与黑格尔等学者截然不同的新的结论。这些可以从明人小说的海洋书写中窥见一二。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记载了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战舰规模、军事编制以及多次军事行动,这些情节虽有小说意味的虚构和夸张,但基本脉络是可以与笔记、史料相互对照印证的。“征进西洋,还用管粮草的官几员,阴阳官几员,通译番书官几员,精通医药的医官几百员,医士几十名,该部知道。……圣旨道:‘征进西洋,还用精兵十万,名马千匹,该部知道’”^{[8]16},除了相应的军事准备,郑和团队以朝贡贸易与诸国结交,如遇挑衅在军事征服后,不杀降,多以安抚显示国威,如几番大败宝象国后,“我这里别无他意,只要你国王一封降书,投于俺元帅;一封降表,奏上我南朝天王。倒换通关牒文,前往别国,专问有我南朝传国玉玺没有,有则作急献来,没有便罢”^{[8]68},宝象国国王还受大明皇帝不杀不侵占的恩威所感,进贡了一些“道地宝贝”,后续诸多国家如童龙国等国国王自表愿意臣服,相应地郑和团队也回馈了大量的财宝。以上情节与史料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在规模、编队、武备上的描

述是一致的^①。尽管如此,郑和团队在军事行动中遵照的是明廷“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策略,只采取了以威慑为主的军事活动,也没有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与绝大多数国家的交往都是友好往来。在诠释西方海洋文明的“海权”理论中,马汉的海权思想认为,海权的产生过程为“商品生产—航运贸易—殖民地”^{[31]2-3},在于国家之家频繁的竞争、冲突。简言之,海权的产生就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血与火”的过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海洋贸易和海洋军事意识,在明代的海洋活动中是以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现出来的。

郑和等人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严守“宣德化而柔远人”^{[32]564}“厚往薄来”^{[32]1316}的原则,在涉及他国主动挑衅,被郑和团队征服后,“导以礼仪”^{[32]2133}“皆推诚以礼待焉”^{[32]908},如小说中在征讨锡兰国后,郑和斥责锡兰国将领只晓得教国王做不善之事,以“天命有德,天讨有罪,顺之则吉,逆之则凶”^{[8]164}之礼教化他,小说体现的这种海洋政治、军事、贸易观念使海外诸国心悦诚服,主动要求纳入“朝贡体系”。小说中还有一则特殊的叙事,讲述郑和等人在苏门答刺国内乱中擒获“伪王”,诸番振服,王子向明廷进贡的历史真实事件,在叙述中显示郑和发兵的匡扶正义之举。这与明成祖“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33]281}的海洋政治观是相吻合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的这些情节体现了明代官方的海洋意识是崇尚和平友好,展示大国之威,承担大国的责任,合理地引导和维持国际秩序,促进各方的共同发展。

在这一点上,它所体现的是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文明海洋意识。当我们从西方视角建构的所谓“海洋文明”中抽离,不再以大航海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精神为核心看待海洋文明,不再以西方所谓的“海洋文明”标准来评价海洋文化价值和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明代小说的这些海洋书写中再次发现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可贵之处,以及其展示的思想意识是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程雁群.明代涉海小说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9.

[2]段江丽.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J].文学遗产,2018(6).

[3]温广宇.增强海洋意识 构建“蓝色工程”[J].江苏统计,1998(6).

[4]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5]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6]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马欢.瀛涯胜览校注[M].冯承钧,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

[8]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M].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6卷(福建六)[M].黄坤,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12]陆人龙.型世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王士性.广志绎:第4卷[M].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洪朝选.洪芳洲先生文集: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5]巩珍.西洋番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朱国祯.涌幢小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7]都穆.都公谈纂(下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8]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张应俞.杜骗新书[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

[20]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1]张本.五湖漫闻[M].善本抄本虞山周氏学佛龕(上册),1915.

[22]郑岳.建巡海道碑记[M]//闵梦得,修.万历癸丑漳州府志:第37卷(艺文志四).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23]王在晋.越缙:第21卷[M]//《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 集部 10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①对此观点,李约瑟从科技角度如磁指向性和磁极性、磁偏角、罗盘等方面把明代海军与同时期亚欧海军相对比,认为明代海军在世界海军层面上进行比较都极为出色(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册,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279-299页)。

[24] 俞大猷. 议处日本贡[M] // 黄宗羲. 明文海: 第81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25] 明世宗实录: 第405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6] 胡宗宪. 胡少保奏疏: 题为献愚忠以图安攘事疏[M] // 陈子龙, 徐孚远. 明经世文编: 第4册第266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7] 周清原. 西湖二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28] 洪楹. 清平山堂话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9] 佚名.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30]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31] 马汉. 海权论[M]. 萧伟中, 梅然, 译.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32] 明太祖实录[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33] 郑和.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记[M] // 钱谷. 吴都文萃续集: 第28卷.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Maritime Sense of the Novels' Maritime Writing in the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Sanyan erpai" and *Popular Historical Romance of Voyage to the West*

CHENG Yanq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maritime writing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a large amount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which projects the maritime life and sense of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for studying the maritime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maritime sense of the people of that time presents a state of duality between the officials and the common people. In the novels of that time, their differences in maritime recogni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s of maritime wealth, and maritime commerce and trade activities. The maritime writing presented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mainly focuses on the sense of maritime commerce, politics and military with a modern significance, both respectively reflecting the various kinds of recognition in the personal maritime trad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formation and their specific situations. Teasing out and reviewing the maritime writing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pulling a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re-understanding the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Key words: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maritime writing; maritime sense; re-understanding

(责任编辑 雪 箫)